

一起走过 / 高振洲

人物春秋 / 陈弼口述 陈坚整理

深情追忆孙宏法同志

喜见“文坛双璧”昂立报域

——写在瞿秋白同志125周年诞辰之际



各种新闻文体不可多得的“多面手”。报社成立理论部之后,组成人员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和筛选的。宏法同志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热门人选。这除了得力于他平时谈吐中透出来的政治素养和理论修养功底外,当然也与他平时编辑新闻稿件时,随手写的一些述评、短评、编后等一类文字颇具功力有关。理论部要定期出版理论专版,对编辑人员的政治素养、理论功底和逻辑思维、组稿能力均有极高要求。在当时的理论部,宏法同志当然是主编此一版面的不二人选。在常州日报多年的共事中,尤其是理论专版的编辑过程中,宏法同志堪称是常州日报中不可多得的勤言、敢言、善言、能言的媒体人,给我留下了极

其深刻的印象。

宏法同志待人诚恳、率直坦率、憎爱分明、助人为乐。凡是与宏法共事的朋友几乎都能随口讲述他这方面的一串串事例和生动感人的故事。记得我2003年因罹患甲状腺癌,手术和救治费用甚巨,宏法同志先后多次来我家中劝慰,鼓励我战胜疾病。最为难得的是,依靠他的人脉和朋友网络,他还专门在湖塘镇一企业中为我物色到一个类似顾问的差事,对解决我的医疗费用不无小补。后来因考虑本人治病和病后康复期间身体欠佳,有拂盛情,终未赴任。其后不久,他又顾及我有“杯中物”的癖好,特意带着“好佬”酒庄的老板给我赠送“好佬”酒,预祝我疾病早日“好佬”!对他此番用心良苦和深情厚谊,我是永远存着感激涕零之心的。疫情期间,为了老有所学,我曾利用“封控禁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读完《菜根谭》《小窗幽记》和《围炉夜话》凡812则,并写下812篇读书札记。宏法同志获悉后,大加赞赏,并认真地阅读了我通过微信传给他的大部分书稿,为我专门写了一首七律,并特意选在去年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日期间,传给我表示祝贺,鼓励我结集成册,以饷读者。这首七律,他事后又字斟句酌,几易其稿,征求我的意见。在他的深情关切和鼓励下,2024年元旦前夕,我,一个84岁的老人,完全依靠亲力亲为,终于完成了这部近80万字的《中国处世三大奇书心解》的编著。

孙宏法同志是1994年从常州工学院调进常州日报的,与我从江苏人民广播电台调入报社为同一年。直到我从报社退休,宏法一直与我有着工作上的直接联系。随着岁月的推移,彼此之间逐步建立了极为深厚的感情和友谊。近些年来又建立了微信联系,“纸”短情长,几乎是一日不见不到彼此的微信,就有牵肠挂肚之感。

今年3月1日上午,正当我为一段时间未接到他的微信信息而踌躇焦虑时,突然接到宏法公子给我的短札,告知宏法不幸离世的凶信。此一噩耗来得太突然了,我一时的不敢相信,甚至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这不是真的”幻想。同日下午,其他同事给我专门发来与宏法公子短札内容几近相同的信息,始信消息确凿无疑。我陷入极度悲痛回忆之中。

宏法同志是常州日报勇于担纲而且真正有实力挑大梁的记者。记得我刚进报社,宏法当时主要是负责综合新闻版(二版)的编辑工作,间或也根据总编指令,外出作一些新闻采访。凭借着他在常工学院报任上的历练和实力,凡是经过他采写和编辑的稿件,再经毕业于北师大汤兰珍老编辑严格把关,送来审稿时,政治导向从未出过偏差,编辑稿件更是文从字顺,几近万无一失。当时适逢报社根据市委部署安排,要报道吴海军这一重大典型。宏法同志主动请缨,独自挑起了采写长篇通讯重任。经过深入采访,他很很快拟出了此一长篇通讯的构想和提纲,经过编委会首肯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写出长篇通讯《吴海军之歌》。见报前的头一天夜班,他又同我一一道反复对稿件字斟句酌。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至为深刻的印象。长篇通讯《吴海军之歌》在常州日报头版按时见报后,市委、市政府领导打来电话,给予表扬和鼓励。之后,宏法同志又围绕吴海军这个典型,搞了一个系列采访,这些报道,都深受读者欢迎和好评,也深得市委宣传部的肯定和赞许。孙宏法,当然也就成为当时常州日报重大新闻报道和长篇通讯离不开的“写手”!

宏法同志是常州日报熟悉和驾驭

最近整理旧藏报刊,在一本杂志内夹着1950年《解放日报》关于上海文代会的专版。经历“文革”抄家,我以为这份资料早已散失了,今日重逢,喜出望外,兴奋得不禁雀跃。

这个专版是《解放日报》1950年7月24日第二版,顶部横排一行大标题: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特刊。版面正中刊登鲁迅、瞿秋白像。鲁迅像右侧说明:“在中国革命事业最艰苦的时期,全心全意地领导和组织了上海进步文艺力量的鲁迅先生。”瞿秋白像右侧说明:“在中国革命事业最艰苦的时期,全心全意地领导和组织了上海进步文艺力量的瞿秋白同志。”由于图文位居显要,赞词饱含深情,非常引人瞩目,动人心弦。图像左右,刊有郭沫若、茅盾、舒同、刘骁、潘汉年的题词。郭沫若题词:“扩大并巩固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为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人民文艺的创造而奋斗!”茅盾题词:“加强团结,加紧学习,配合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题词句句珠玑,洋溢着对上海文艺界的殷切期望。右上角刊登冯雪峰题为《为有计划地加强文艺与群众的联系而努力》的重要评论,冯雪峰时任全国文联第一届常委、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其他刊有(十个月来的群众文艺)《大众电影四期来的工作情况》《漫画月刊三个月》《人民诗报一卷的总结》《戏曲报半年工作的总结》。全版充分反映了上海解放初期文艺学术界积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早年我因爱读文学名著,最崇敬“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通过阅读鲁迅传记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认识到鲁迅、瞿秋白都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又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正如茅盾在赠丁景唐诗中所说:“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抗战时期,李何林在关于中国近20年文艺思潮的论著中指出:鲁迅、瞿秋白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事业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誉称“文坛双璧”。在党报的突出位置,图文并茂同时给予鲁迅、瞿秋白崇高评价,这个专版可能是第一次,意义深远,值得关注与重视。

重温这一专版,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鲁迅、瞿秋白、冯雪峰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领导人,他们亲密合作,成果丰硕。冯雪峰,浙江义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奉中共组织之命与鲁迅商谈成立“左联”。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成立大会后,冯雪峰整理鲁迅在会上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1年,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一起编辑出版《前哨》,纪念“左联”五烈士。此时他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促使鲁迅和瞿秋白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同年10月,在瞿秋白指导下,冯雪峰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新任务》,经瞿秋白修改定稿,其主旨与鲁迅的要求“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是一致的。成为“左联”指导性文件。此后,秋白与同志们共同努力,“左联”摆脱困境,进入蓬勃发展时期,队伍扩大到约400人,除上海外,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地及东京也成立组织,与社联、剧联、美联、教联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形成左翼文化大军,对中国文化史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鲁迅和秋白亲密合作,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又说:“从1931年11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一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这反映了当年许多同志的感悟与共识。

秋白和鲁迅在斗争中建立的革命情谊光照日月,传颂千古。1962年和1980年,我曾先后瞻仰上海鲁迅故居和鲁迅纪念馆,并撰诗《友谊——访上海鲁迅故居》(刊《常州日报》1962年6月10日)和散文《两个亲密的人——鲁迅和瞿秋白》(刊《羊城晚报》1980年11月7日),收入《怀霜诗钞》等书。在鲁迅纪念馆

内,陈列着鲁迅书赠秋白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录何瓦琴句)对联旁挂着徐悲鸿《鲁迅与瞿秋白》的素描。鲁迅亲书集联,表达他对秋白同时也是对党的敬爱之情。秋白在未曾同鲁迅见面前,曾写了一封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信给鲁迅,信的开头以“敬爱的同志”相称,并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鲁迅很高兴地写了回信,也以“敬爱的J-K同志”相称。上海三年,秋白夫妇曾四次在鲁迅家中避难,秋白和鲁迅夜以继日,合作多篇杂文,并合编《肖伯纳在上海》等书,有力地粉碎了反动当局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围剿”。

在鲁迅故居,陈列着一部由秋白编定的精装本《鲁迅杂感选集》和秋白的一份手稿《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秋白和鲁迅多次谈心,认真阅读鲁迅作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精辟地分析了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深刻地评价了鲁迅的杂文,肯定鲁迅的历史功绩和战斗传统,准确地概括和热情歌颂了鲁迅的伟大精神。这篇长达17000多字的宏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鲁迅纪念馆大厅中间,有一个斜形陈列柜,陈列着《海上述林》上下卷和鲁迅的手稿影印件:鲁迅书《海上述林》分发名单和募得出版资金200元,“余额由我担任”。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

后,鲁迅用“诸夏怀霜社”名义编辑出版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诸夏怀霜”,暗示全国人民都在怀念秋白。

毛泽东同志曾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丧事,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主任,冯雪峰特将毛泽东的名字列入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中。解放初,冯雪峰任鲁迅著作编辑社社长兼总编,出版了大量鲁迅著作和有关成果。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冯雪峰难过地向瞿秋白同志告别,秋白说:“不要为我的安全担忧,你们突围北上肯定比我艰难,让我们共同来承受严峻的考验吧!”又说:“雪峰,这件长衫伴着我战斗了七八年,现在给你做个纪念,伴着你出征吧!”这件长衫成了历经万水千山的革命文物。最早的《瞿秋白文集》四卷本由冯雪峰主编。

鲁迅、瞿秋白和冯雪峰是生死相依、亦师亦友的亲密战友,其深厚纯真的革命情谊和崇高风范感人至深!

2024年1月29日,是瞿秋白同志125周年诞辰,谨以此文作为一柱心香,敬献给“江南第一燕”、伟大的民族魂——瞿秋白同志。

当过兵的都知道,站岗是军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过兵的我每次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第一哨哨兵挺拔笔直纹丝不动的英姿时,总会回忆起50多年前当兵时一段无缘站岗的往事。

1968年3月,我参军入伍来到部队,很快就记住了当时部队流行的顺口溜,如“当兵不练武,不算尽义务”“当兵不站岗,白来走一趟”等等。当兵,岂能不站岗?挺拔的军姿、顽强的毅力,基本是靠每天几个小时的站岗来练就的。

而我却有一大遗憾,入伍当兵的

级革命的文学新任务》,经瞿秋白修改定稿,其主旨与鲁迅的要求“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是一致的。成为“左联”指导性文件。此后,秋白与同志们共同努力,“左联”摆脱困境,进入蓬勃发展时期,队伍扩大到约400人,除上海外,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地及东京也成立组织,与社联、剧联、美联、教联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形成左翼文化大军,对中国文化史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鲁迅和秋白亲密合作,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又说:“从1931年11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一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这反映了当年许多同志的感悟与共识。

秋白和鲁迅在斗争中建立的革命情谊光照日月,传颂千古。1962年和1980年,我曾先后瞻仰上海鲁迅故居和鲁迅纪念馆,并撰诗《友谊——访上海鲁迅故居》(刊《常州日报》1962年6月10日)和散文《两个亲密的人——鲁迅和瞿秋白》(刊《羊城晚报》1980年11月7日),收入《怀霜诗钞》等书。在鲁迅纪念馆

内,陈列着鲁迅书赠秋白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录何瓦琴句)对联旁挂着徐悲鸿《鲁迅与瞿秋白》的素描。鲁迅亲书集联,表达他对秋白同时也是对党的敬爱之情。秋白在未曾同鲁迅见面前,曾写了一封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信给鲁迅,信的开头以“敬爱的同志”相称,并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鲁迅很高兴地写了回信,也以“敬爱的J-K同志”相称。上海三年,秋白夫妇曾四次在鲁迅家中避难,秋白和鲁迅夜以继日,合作多篇杂文,并合编《肖伯纳在上海》等书,有力地粉碎了反动当局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围剿”。

在鲁迅故居,陈列着一部由秋白编定的精装本《鲁迅杂感选集》和秋白的一份手稿《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秋白和鲁迅多次谈心,认真阅读鲁迅作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精辟地分析了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深刻地评价了鲁迅的杂文,肯定鲁迅的历史功绩和战斗传统,准确地概括和热情歌颂了鲁迅的伟大精神。这篇长达17000多字的宏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鲁迅纪念馆大厅中间,有一个斜形陈列柜,陈列着《海上述林》上下卷和鲁迅的手稿影印件:鲁迅书《海上述林》分发名单和募得出版资金200元,“余额由我担任”。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

后,鲁迅用“诸夏怀霜社”名义编辑出版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诸夏怀霜”,暗示全国人民都在怀念秋白。

毛泽东同志曾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丧事,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主任,冯雪峰特将毛泽东的名字列入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中。解放初,冯雪峰任鲁迅著作编辑社社长兼总编,出版了大量鲁迅著作和有关成果。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冯雪峰难过地向瞿秋白同志告别,秋白说:“不要为我的安全担忧,你们突围北上肯定比我艰难,让我们共同来承受严峻的考验吧!”又说:“雪峰,这件长衫伴着我战斗了七八年,现在给你做个纪念,伴着你出征吧!”这件长衫成了历经万水千山的革命文物。最早的《瞿秋白文集》四卷本由冯雪峰主编。

鲁迅、瞿秋白和冯雪峰是生死相依、亦师亦友的亲密战友,其深厚纯真的革命情谊和崇高风范感人至深!

2024年1月29日,是瞿秋白同志125周年诞辰,谨以此文作为一柱心香,敬献给“江南第一燕”、伟大的民族魂——瞿秋白同志。

当过兵的都知道,站岗是军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过兵的我每次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第一哨哨兵挺拔笔直纹丝不动的英姿时,总会回忆起50多年前当兵时一段无缘站岗的往事。

1968年3月,我参军入伍来到部队,很快就记住了当时部队流行的顺口溜,如“当兵不练武,不算尽义务”“当兵不站岗,白来走一趟”等等。当兵,岂能不站岗?挺拔的军姿、顽强的毅力,基本是靠每天几个小时的站岗来练就的。

而我却有一大遗憾,入伍当兵的

头两年里却有岗轮不到站,整天整夜与耕牛打交道。一进部队,我就被分配到农场执行种田任务的连队的养牛班。当时班里共养了3头耕牛,农忙时专门负责耕地耙田,农闲时就牵着耕牛去远郊连队几十里外的大别山麓放牧,并吃住在大山里,直到入冬才打道回府。那个时候我们放牛的目的很明确,一就

是为部队、国家节约饲料,宁可自己吃苦也要为革命放好牛,让牛吃好吃饱;二是一个大忙下来,要让耕牛休养生息,能吃上大自然的青草茅柴头和嫩枝绿叶,这样的散养放牧,更能促使耕牛长膘。那个时候我们班的口号是:“养牛为革命,为革命放好牛。”

我们视耕牛如战友,没日没夜地照顾

护理关爱有加。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牛也一样。于是我们夜里也会起来给牛喂料饮水。为此连队领导特批养牛班,可留两名责任心强、认真负责的战士无须参加站岗值勤。我因为从小在家帮助爷爷放过牛,对牛也有感情,因此我就成了特批人员之一,也就是说,在我们连队执行两年的种田任务里,我无缘站岗放哨。



1950年7月24日《解放日报》第二版

生活琐记 / 陆林深

大树之恋

我喜欢种树,也喜欢看树,还喜欢写树。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家门口种了好几棵大树,真正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只有一棵樟树。现在村庄虽然拆迁了,但我提出要求,把这棵樟树保留下来,今后建学校就捐赠给学校,建小区就捐赠给小区,只是希望人们善待它。

我也喜欢看树。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听说有古树名木,我都想方设法去观瞻。

在陕西黄帝陵,我看到一棵侧柏,名字叫“轩辕黄帝柏”,树龄有5000年,它的树干如刀劈斧凿似铜铸铁浇;苍劲挺拔,树冠郁郁葱葱,层层叠叠,雄伟绝美,四季不衰,充满生机。据统计,中国这样超过5000年树龄的古树只有五棵,全是侧柏,而且都在陕西境内:三棵在黄陵县,一棵在白水县,第五棵在洛南县的深山里。它们把根牢牢地扎进泥土的深处,沐浴着中华历史文明的交替,从它们身上我感悟到生命的伟大。在山西晋祠里,有一棵侧柏,3000多岁了,横卧在离地面一米高的地方。树干粗壮笔直,历经沧桑,依然光亮润泽。树叶稀疏,像老汉秃顶的头发,但精神矍铄坚韧顽强。

四川广元剑门关,有一条古栈道,只有两三米宽,刘备、诸葛亮等三国人杰在这条道上不知走过多少回。道路两旁古木参天,一眼望不到头。其中有一棵叫秦柏的树,有2500多年历史了。我们七八个人才能把它合抱过来。这一路到成都都有380里,历朝历代,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要在这条道上种树,据说有十万棵。

在浙江天目山,有一个景点叫大树王。那山里都是千年古树,直径都在两米以上,笔直挺拔,没有一点弯曲,直插云霄。我过去在天宁寺大雄宝殿里看那么高、那么粗的大树,十分惊讶天下哪有这么长的木料,怀疑是接出来的。看了这里的大树,我的疑问全打消了。

我还到台湾的阿里山,瞻仰了阿里山神木。那棵大树有40多米高,抬眼望不到天,树干像擎天柱,五六个人才能合抱起来。

前不久我经过老家,特意去看望了那年种下的小樟树,它已快满60岁了,笔直粗壮,树干,巨伞擎盖般的树冠,我油然而生敬意。这是我向故乡泥土奉献的一份最虔诚的礼物。我也深深地眷恋着滋养大树的这片故乡泥土。



威电发电100年

我无缘站岗放哨

秦永培

头两年里却有岗轮不到站,整天整夜与耕牛打交道。一进部队,我就被分配到农场执行种田任务的连队的养牛班。当时班里共养了3头耕牛,农忙时专门负责耕地耙田,农闲时就牵着耕牛去远郊连队几十里外的大别山麓放牧,并吃住在大山里,直到入冬才打道回府。那个时候我们放牛的目的很明确,一就

是为部队、国家节约饲料,宁可自己吃苦也要为革命放好牛,让牛吃好吃饱;二是一个大忙下来,要让耕牛休养生息,能吃上大自然的青草茅柴头和嫩枝绿叶,这样的散养放牧,更能促使耕牛长膘。那个时候我们班的口号是:“养牛为革命,为革命放好牛。”

我们视耕牛如战友,没日没夜地照顾

护理关爱有加。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牛也一样。于是我们夜里也会起来给牛喂料饮水。为此连队领导特批养牛班,可留两名责任心强、认真负责的战士无须参加站岗值勤。我因为从小在家帮助爷爷放过牛,对牛也有感情,因此我就成了特批人员之一,也就是说,在我们连队执行两年的种田任务里,我无缘站岗放哨。

成立江苏电力系统第一个党支部,点燃革命火种

□李慧 秋冰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1926年,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江浙区委通过西子洋行介绍王寿生到震华电厂,以外线工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配合北伐军的军事进攻,壮大党的革命力量。从此,一颗革命的火种扎根威电,工人运动在常州大地开始燎原。

王寿生,又名王亦,1906年10月出生在上海浦东,192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常州后,王寿生参与了中共常州独立支部的筹建,于1927年1月担任支部干事,负责工人运动,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倾注在这片蕴藏着巨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红色土地上。他还

秘密组建武进县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将工会人数发展壮大到万余人。

王寿生的到来,给震华电厂的工人们看到了新希望。他为人正直,乐于与工友们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疾苦,敢于为工友争取权益,同时,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在工友中威信很高。在他的启发引导下,工人们逐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这为震华电厂建立、发展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很快,青年外线工杨宝森(后改名杨宝忠)进入王寿生的视线,他思想进步,曾在上海参加声援“二七”大罢工斗争。两人一见如故,王寿生把他列为了重点培养对象。时机成熟之时,王寿生道明了自己的身份,并把藏在身上的那张印有镰刀和斧头标记的传单递给了杨宝森。看到传单,杨宝森激动万分,没想到自己心中仰慕的共产党就在身边。王寿生告诉他:“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看,把我的性命交给你了,你我两个人也就把性命交给共产党了。”杨宝森听罢,紧紧握住王寿生的双手,坚定地说:“相信我吧!”从那一刻起,杨宝森心中燃起了一团为理想而奋斗的火焰。

1926年底,杨宝森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威电历史上发展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杨宝森没有辜负组织的希望,在迎接北伐军进常州城的斗争中表现英勇,第一个打开城门,第一个将革命军的旗帜挂到了城墙上。

王寿生和杨宝森在组织关系上保持单线联络,他俩利用电厂外线工作流动性大的有利条件,很快与常州南门一带的纱厂、布厂和西子洋行的油厂等工人取得了联系,并把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

1927年1月,为顺应形势的发展需要,王寿生等人在震华电厂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这是江苏电力系统第一个党支部,由王寿生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当年3月,党支部已有外线工杨宝森、机匠许金祥、张道涛等9名党员。不久,王寿生又在震华电厂组织了工会,首批会员就达143人。



图为王寿生。

震华电厂党支部的成立,为常州的革命斗争翻开了崭新一页。